

大王庙

王振洲

治理黄河功劳显著的河务官员,死后被皇帝封为“大王”始于宋代。获此殊荣的共有四人。宋代的谢绪为“金尤四大王”,清代的黄英杰为“黄大王”,朱之锡为“朱大王”,栗毓美为“栗大王”,民间视大王们为河神。

过去,黄河在某处决口被堵复后,往往要在此处建座大王庙,供奉河大王和纪念堵口成功。在郑州辖区内的黄河大堤上,童年时看到过两座大王庙。一座在申庄村北边的黄河大堤上,叫黄大王庙,不知建于何时,比较破败,没有多少特色。不过这一段的大堤比别处的大堤宽好几倍,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后,一些灾民纷纷逃到这里建庵安家,一时连草庵也搭不起的,就挤在大王庙里。

石桥村北边大堤上的大王庙,正殿高大、气魄、美观,尤其庙顶上绿色琉璃瓦耀目,因此群众称之为绿大王庙。此处决口还留下个巨大的水潭,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,水面仍有几百亩。由此可见当年洪水冲刷之烈。民间传说,决口之后,皇帝命令三个月堵复,可是眼看半年时间过去,决口仍没有堵住,如果到了春天河水涨了,困难会更多;于是皇帝便派清官刘统勋前来坐镇。那刘统勋来到后看看水势,摘下自己的官帽仍到口中,只见帽子在水中滴溜溜转,水冲不走,水的流速也渐渐慢了,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决口堵住了。这里决口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八月,乾隆朝的刘统勋早已作古,怎么可能来堵口?实际上这是群众崇拜清官情绪的一种反映。

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,在绿大王庙中驻扎了一个小队,这些家伙坏事做绝,连他们住了两年多的地方也不放过,临败退时对绿大王庙进行了多处破坏。以后绿大王庙没人管理,也没有修复,任其在风吹雨打中逐渐凋敝,实在可惜。如果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,定会成为黄河景区中一个受青睐的景点。

御笔也过年

郭华悦

唯有读书高的古代,笔杆子的地位一向是挺崇高的。皇帝的御笔,也就更是地位非凡了。所以过年也不能忽略了御笔。

每年的除夕,一大早,皇宫内就要举行“封笔仪式”。这“封笔”的时间,是一天。从除夕到初一,皇帝是不能动笔杆子的。这一仪式,是何用意呢?很简单,御笔们辛苦了一年,国家大事皆出自笔下,过年这样的时刻,当然也要给它们放假了。

每年过年的“封笔”,是为了显示对御笔的重视,也感谢其一年来的辛劳。这个规矩,在多数朝代里,皇帝们都会严格遵守。可若是,碰到了紧急情况,该怎么办?

当然,皇帝能写圣旨,批复奏章,也能用“口谕”的方式传达。正常情况下,哪怕是有事,动动嘴传达一下自己的意见,也就能解决了。不过呀,乾隆皇帝时,还真碰到了一件动嘴也无法解决的急事儿。

那会儿,外头正在打仗。军情紧急,正好有一份报告在除夕这夜送到了宫中。这份报告,急需乾隆做出回复。可打仗的地方,离京城还挺远。若是让人传达“口谕”,一来怕意思不到位,二来也怕延误。思来想去,乾隆皇帝想到了一个办法。

这个办法,就是请人代笔。既然宫中皇帝专用的御笔都放了年假,不能动用,乾隆于是叫来大臣,令大臣用自己的笔,写下乾隆的回复。接着,再将折子用加急“快递”送往前方。这么一来,既没破坏规矩,又不至于延误军情。

看吧,就算是皇帝身边的一支笔,也得有过年的权利呢!

发现朝中舆论风向有变,年高久病的杜佑随即致书刘禹锡,告而慰之。刘禹锡如获至宝,伏案细读,如沐春风。但是,杜佑信中所言“浮游渐消”,可知仍有固执阻止之人。况且,皇帝有诏在前,起用程异已是破例,若再将其余人等起复,岂非扫了金口玉言的颜面?

元和七年(812年)中,刘禹锡在朗州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相伴刘禹锡多年的老友董颖和顾象相继病故,在痛失知己的悲辛中,刘禹锡接连为二故友写下墓志铭,以寄托深深哀思。刘禹锡不知,这样残酷的离别,究竟是预示着自己将要离开朗州,还是预示着自己亦将化为朗州的泥土?

十一月,杜佑病逝的消息传至朗州,刘禹锡更觉惊骇,不意新近通信,竟成绝笔。虽然杜佑居相位近十年,未能维护永贞革新,亦未能成为刘禹锡之挚友,但禹锡毕竟是杜佑门下旧吏,既有教导之惠,又有知遇之恩,虽然远在朗州,禹锡仍遥设祭坛,以尽门吏之仪。

年夜饭:一场精神的仪式

周华诚

年夜饭,哪里只是一顿晚餐。那是一年收成的总结陈词,那是人神共饮的欢乐盛宴,那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仪式。

其实在除夕之前,年已经开始了。哪一天大扫除,哪一天杀年猪,哪一天杀鸭杀鸡,还要做糕点、炸豆腐,想想简直是头绪纷繁。然而乡下人们一点儿不慌张,他们有条不紊地准备着。

我老家在浙西常山县。那里的年夜饭,跟别的地方一样,从除夕这天的一大早就开始准备。乡下有灶间,一个传统的土灶,烧柴火,锅里一定蒸着什么、煮着什么,白茫茫的蒸汽氤氲,灶膛中干燥的劈柴燃烧,散发着温暖的火光;有一台煤气灶,灶上一定也蒸着什么、煮着什么;地上呢,用炭火铺了一堆,上边坐着陶钵,咕嘟咕嘟地往外冒香气。

上午是要“谢年”的,这也就是外人常见的请“年菩萨”。父亲把方桌搬到屋前平地上(有时也在中堂),摆上大盆的猪头,整只的鸡鸭,倒上酒,把供案摆得满满登登。又要燃烛、焚香,烟气袅袅,气氛神秘而肃穆。放几响炮仗,执香拜祀神祇。

关于炮仗,有讲究,须是大炮仗,提前放在灶台上烘了两夜;点着后,一冲上天,作两声巨响,干脆有力,气度豪迈。

父亲执香,在屋前、堂前、灶前一恭一拜。父亲平时风趣有加,做这些时,神情很严肃,正对香案或灶台,双手夹香合十,口中念念有词:家堂佛爷、招财爷、山皇土地,

保佑来年人口平安,五谷丰登,六畜兴旺……然而不是这些话,我都不曾好好请教过,因自小对此仪式有颇多敬畏,只是远远地看,甚或有时还借故避开。那一年小妹七八岁,见父亲如此,甚感兴趣,不知怎的就走过去,立于父亲右侧,学他的样子鞠躬祝拜,令父亲和我们忍俊不禁。父亲拜了中堂,小妹也拜中堂;父亲拜了灶王爷,小妹也拜灶王爷。我们和母亲在旁边看得嘻嘻哈哈,笑作一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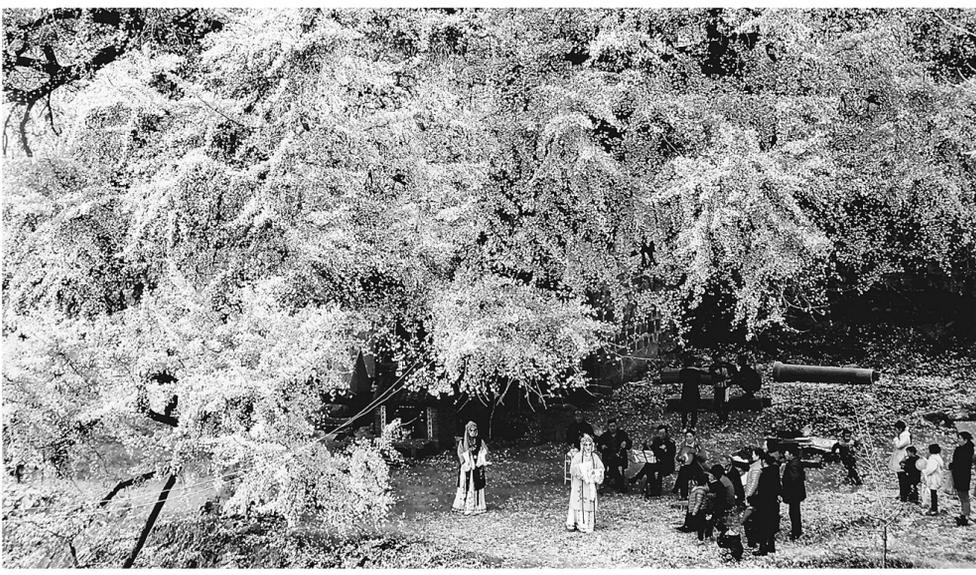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仪式做完,也就是午饭了,依惯例是简单的——灶下随便夹几筷菜,舀一勺汤,就可以把一碗米饭妥妥地吃完。鸡、鸭、鱼、肉、虾、蟹、笋,不是在炉火上炖着,就是已经洗好,光鲜亮丽地摆在了砧板上。总体来说,肉类都要早早炖上,年夜饭的盛宴上,无论如何少不了几个大瓦罐的:鸡、鸭、猪蹄、红烧肉,都是这样的大瓦罐;此外还要有各样的小炒、肚片、鲜虾、冬笋肉片、牛肉小炒,这一类的炒菜,要趁热吃,不宜太早炒制。

接着,就是贴春联,贴门神。父亲搬木梯,我们端碗、捧春联,前呼后拥。老家瓦房,门大而高,父亲把梯子架好,我和弟弟一边扶梯子,一边用脚抵着梯脚,把满满大碗的米粥汤递给父亲,父亲用刷子蘸了稠稠的粥汤糊上门楣,小妹踮着脚尖把春联和关公、秦琼的门神展开,递上。我们一边读,一边争论上联还是下联,左边还是右边。这样忙碌半天,所有的大门与小门,都贴上了红通通的对联与

门神。到了下午三点,渐渐稠密起来的炮仗声,划破乡村的天空。炮仗是吃年夜饭的信号弹。吃年夜饭,要赶早。但是太早了,又不成样子。每每听到远处人家三点多就放炮仗,我们总是说:还是晌午呢,哪像是过年!父亲也便对团团转的母亲说,慢些来慢些来,四点多开席不晚。

好了,年夜饭的一席饭菜,终于都准备妥当了。我们鱼一般穿梭,把一道道菜端上桌,父亲在桌上摆好了碗筷。八仙桌,八副碗筷。每个碗里都浅浅地倒上了酒。这是预备给祖先们吃的。然后,父亲拿着炮仗到屋前去了。我们和母亲从灶间出来,母亲解下围裙,我们走到门外互相拍打身上的衣服,认真地掸掸,边掸边说:过年了,把一年的霉味全都掸掉,明年一定运气又红又旺。

炮仗响了,它蹿过门前的树梢,冲上云霄,啪啪两声巨响,红纸屑一片一片飘落下来;又一支炮仗上天了,接着又是一支,纷纷飘落的无数红纸屑是多么激动人心;在四起的炮仗声中,我们相互招呼着,在丰盛的桌前坐下来。桌面上摆满了菜肴,乡下所能拿出的最好吃的东西统统展示出来,炖的煮的蒸的炒的,大罐小盆大碟小碗,一样一样的盛器里,摆满了丰盛的食物——于是,这不再是日常的一顿饭了,这是一个家庭每个成员精神世界的一次盛宴,这是走远的祖先与当下的我们同席共饮的一次聚首欢娱。



唱响中原 冯安摄影

明代如何过年

丁璐

明人沈榜在明万历十八年(1590年)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,他所著的地方志书籍《宛署杂记》,记载了明代京城百姓的一些过年方式。

400余年前的京城,正月初一大早起来,一家之主就会带领全家拜天地,拜祖先的牌位。至于祭神祭祖的仪式,也是隆重而严格的。把草纸剪成纸钱,配以不同的供品,分别供奉于祖先牌位和神像前。祖先牌位的供品为三牲熟食,纸钱在三天后焚毁;神像前则供以果子素食,纸钱在过了元宵之后才焚毁。祭祖完毕,给长辈祝寿,全家一起做匾食。匾食是北地方言,泛指馄饨、水饺之类的面食。若是出门游玩,路上见到了亲戚朋友,

小辈就当街给长辈磕头行礼。无论男女老幼,在节日期间皆以金箔纸折成飞鹅、蝴蝶、蚂蚱等形状的饰物,插在头上,用于烘托喜庆气氛,名为戴“闹嚷嚷”。大的闹嚷嚷有巴掌那么大,小的如铜钱大小。一般人都是戴一个,也有故意炫富的有钱人,在头上插满了闹嚷嚷。

明代的烟花爆竹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制作水平,品种有数百种之多,可以表现出逼真的花草人物等图案。烟花从制作材料和形态上进行区分:用泥包裹的叫“砂锅儿”;用纸包裹的叫“花筒”;用筐封装的叫“花盆”;只发出声响的叫“响炮”;能飞上天空的叫“起火”;飞上天空后发出响声的叫“三级浪”;在地上旋转

的叫“地老鼠”。一些权贵大户人家,每年都会请巧手匠人制成各色烟花,在除夕通宵燃放,一年仅是放烟火就要数百两银子,相当于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。

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六,是赏灯的日子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各地的制灯工匠和商人纷纷云集京城,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东安门外迤北大街售卖。灯市上形形色色的花灯,应有尽有,专程前来观赏的人摩肩接踵,男女皆有,热闹非常。正月十四开始试灯,各种花灯开始点亮悬挂;正月十五灯会正式开始;正月十六罢灯。

罢灯这天晚上,京城的妇女会结伴夜游,由其中一人持着点燃的香在前面走,其余的人跟在后面,名为“走百病”,祈祷在新的一年里无灾无咎。如果走过的地方有桥,就三个妇女相携而过,取度厄之意。在城门外,妇女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城门钉,如果能摸到,就是吉兆。这一夜,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都通宵不闭,任由百姓往来,士卒校尉则通宵巡逻,维持秩序。至此,年才算是真正过完。



向阳(油画) 刘勇

猴的成语

陈永坤

弄鬼掉猴:清·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六回:“心里再要买一个,又怕那些牙子家出来的,不干不净,也不知道毛病儿,买了来三日两日,又弄鬼掉猴的。”比喻调皮捣蛋。心猿意马:汉·魏伯阳《参同契》注:“心猿不定,意马四驰。”道家语。如同猴跳马跑一样控制不住。形容心思不专。

尖嘴猴腮:清·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:“像你这尖嘴猴腮,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。”形容人相貌丑陋难看。

杀鸡吓猴:清·李宝嘉《官场现形记》第五十三回:“俗话说得好,叫作‘杀鸡吓猴’,拿鸡子宰了,那猴儿自然害怕。”比喻严惩一人来吓唬另外的很多人。也作“杀鸡骇猴”“杀鸡给猴看”。

沐猴而冠: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: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,果然。”沐猴:猕猴。冠:戴帽子。猕猴戴帽子。比喻本质不好,却装扮得很像样子。

猴骑土牛:唐·李白《赠宣城赵太守悦》诗:“猕猴骑土牛,羸马夹双辕。”猕猴骑着泥制的牛。比喻晋升极慢。

猿臂之势:《新唐书·李光弼传》:“光弼曰:‘不如移军河阳,北阻泽、潞,胜则出,败则守,表里相应,贼不得西,此猿臂之势也。’”猿猴之臂长而且敏捷,能运转自如。比喻能攻能守,可进可退的作战形式。

亡猿祸木:《渊鉴类函》卷四三三引《汀州志》:“唐大历中,有猴数百集古田杉林中,里人欲伐木杀之。中一老猴忽跃去近邻一家纵火焚屋。里人惧,亟走救火,于是群猴脱去。”后以“亡猿祸木”喻毁损人反而害己的行为。

《百濼,朝向这边》

张宁

这部纯爱小说,是日本当红小说家“天才乙一”讲述的一个初恋故事。从谎言开始的爱恋,谎言背后是那些少男少女说不出的真心话。

许多错失的美好,并非我们不想抓住,而是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勇敢。初恋往往精彩到难以忘怀,却又悔恨至感慨一生。骄傲与自卑,冲动与懦弱交织在一起,带着这样不成熟的心智,偶遇那心动的对方。当分别时,那一句“百濼,朝向这边”,便是忘不了的那段转瞬即逝的年少时光。

乙一是日本著名小说家中田永一的又一笔名,1996年,17岁的他以《夏天·烟火·我的尸体》荣获第六届集英社“JUMP”小说·纪实小说大奖,如今已是日本当代最重量级的大众小说家之一,作品领域横跨恐怖、推理、纯爱等。

连载



“穷巷唯秋草,高僧独扣门”使刘禹锡感动万分,再与君素上人坐禅论佛,清境观照,证悟一心,使禹锡有“惟有摩尼珠,可照浊水源”之感,而发出佛教乃“出世回法”之叹。

于沅水畔招隐亭附近之陋室,为禹锡照顾年迈母亲,养育三个幼小儿女。她以温情和坚韧默默地支撑着刘禹锡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,是禹锡心中最温暖的一抹亮色。

政治迫害之苦,亲人失去之痛,现在相依为伴的妻子又离他而去,留下三个孩子,还有一个需要赡养的年近八旬的老母,禹锡苦不堪言!刘禹锡笔墨和眼泪相和,写下《伤往赋》,痛悼爱妻。

从此之后,刘禹锡再未续弦,孩子交给家中女佣秦娘代为抚养。

胸怀大略的刘禹锡报国无门,心存苦闷。再加上常年水土不服,爱病、良友、妻子病逝,使身在滴籍的刘禹锡病了,病在大唐的秋天,“寂寂重寂寂,病夫卧秋斋。”他病得如此沉重,“伊我今久而滋漫。”秋风归雁,滴客先闻,更触痛禹锡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。

京诏书在路上磨磨蹭蹭地行走两个月之后,终于为他带来了重生的灿烂光明。

到底京城中消息灵活,刘禹锡等人被召回长安的消息,堪称十年来最具爆炸性的新闻,深深地震动了大唐的官场。人们霍然发现,王叔文的余党们竟从漫漫时光的压迫中挺了过来,行将重回他们曾经辉煌耀眼的舞台。

朗州友人谁不知刘禹锡归心似箭?不待刘禹锡一拜访辞行,众人便不约而同地来与他道别。

汨罗江头,柳宗元已待刘禹锡多时。接到诏书时,喜出望外的柳宗元不愿独自回京,便思刘禹锡回京可从永州经过,两人若一同回京,一路吟诗作赋,定是一桩美事。刘禹锡接到书信,亦爱有此良朋贤友同行千里之途,便欣然应允。

刘、柳二人水陆相继,日行数十里,只叹无法追上早已飞驰千里的灵魂。行至洞庭湖时,二人望着烟波浩渺、素光无际的湖水,不由浩叹。柳宗元道:“去岁秋夜,读梦得《望洞庭》诗:‘湖光

秋月两相和,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,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’以为想象丰富,比喻恰当,色调淡雅,精美绝伦。”

白银盘里一青螺”之语,将壮阔不凡的气度寄于高卓清奇之情致,实乃匪夷所思之妙句。

刘禹锡拱手道:“禹锡素仰杜子美,此诗学于美诗而作。尝过洞庭,虽为一篇,然思杜员外落景,的确是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画卷。不过多时,这幅美丽画卷便成为大唐英贤们共聚一堂的绝佳背景。”

裴度、李绛、权德舆、崔群、白居易、韩愈等人正在朝中受重用,自然成为返京官员们争相讨好的对象。虽然同是其乐融融的场面,但刘禹锡鲜明地感到,在都亭驿中悲愤激昂的人们,方进京城不过数日,其精神、志向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诚然,趋利避害是埋藏在心灵底层的根本人性,尤其对于在偏远恶地羁留许久的人们,当他们再度置身于繁华满目的长安之春时,“留下”便成为战胜一切的强大欲望。